

以醫療合作參與全球治理 香港經驗可服務上合國家



議事論事

林順潮

9月1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一年前的同一天，正是在上合組織天津峰會上，習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一年下來，倡議已獲近1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響應與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組」在紐約、日內瓦、維也納相繼成立，成員超過60個國家。從天津到比什凱克，全球治理倡議一步步從理念走向實踐。

習主席在比什凱克峰會上指出，這次會議聚焦加強聯合國作用、構建多極世界，彰顯了上海合作組織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時代擔當。他提出以「上合力量」驅動亞歐大陸繁榮共興，以「上合智慧」推動全球南方發展壯大，以「上合行動」引領全球治理改革完善。與會各方發表了《比什凱克宣言》，以天津峰會成果為基礎修訂了《上合組織憲章》，並通過了涵蓋安全、經濟、人文合作和組織建設等近30份合作文件。

筆者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香港醫療界服務了幾十年，不禁在想：上合組織涵蓋全球近半數人口、四分之一經濟總量，在這盤棋裏，香港能扮演什麼角色？醫療界又能貢獻什麼？

近期全球治理的討論越來越多，但講到底，關鍵還是「怎麼做」。習主席在比什凱克進一步闡述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

極化」——主權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則，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邊主義、對話協商是關鍵路徑，互利共贏、普惠包容是發展方向。這些放在醫療合作上，特別適用。

其實上合組織在衛生健康領域已有不少合作成果。今年4月，第九次上合組織成員國衛生部長會議在比什凱克舉行，各國討論了疾病預防、醫療系統改善等議題。今年2月，中國—上海合作組織代謝性疾病合作中心在上海成立，目標是3年內為成員國培訓2000名專家、分享500項醫療技術。「防癌健康上合行」項目自2025年啟動以來，已走訪阿塞拜疆、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上合行動」。

連接各方資源的「合夥人」

香港在這些合作領域能做什麼？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講過一句話，筆者認為講得很到位：香港要善用醫療領域所長，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說到底，香港的優勢不在於規模，在於連接——連接內地的資源和技術、連接國際的專業標準和網絡、連接「一帶一路」國家和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實際需要。全國政協副主席、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先生說得好：香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有獨特優勢，可以助力國家建立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話語權，成為有效支持我國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節點。

定位清楚了，接下來是行動。全球治理倡議強調「注重行動導向」，上合組織也要靠「上合行動」來引領改革。香港醫療界需要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

香港醫療界在醫療公益和國際援助方面，已有幾十年的積累。由方黃吉雯女士創辦的「健康快車」，1997年從香港出發，走遍全國28個省、自治區，至今已為逾25萬名白內障患者免費做手術。筆者在2004年發起的「亮睛工程」，至今在9個省份成立29個扶貧眼科中心，培訓逾140名白內障手術醫生，完成逾20萬例手術。2018年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發起的共享基金會，在老撾、柬埔寨、吉布提、塞內加爾及毛里塔尼亞五國完成超過3萬例免費白內障手術，2026年5月基金會更在日內瓦世衛大會舉辦邊會，是香港非政府組織首次舉辦邊會。

三個項目，從內地到「一帶一路」，從直接服務到能力建設，見證了香港醫療界參與國際醫療援助的歷程。這些前期工作，證明了模式可行、團隊有經驗。接下來的課題，是如何在上合組織這個更大的舞台上，把這些經驗系統化、規模化地推廣出去。

把「授人以漁」的模式複製到上合組織國家。「亮睛工程」在內地20多年的實踐證明，培訓當地醫護、建立標準化流程、留下設備和技術，當地醫院便能靠自己持續運作。下一步，可選幾個有條件的上合組織國家，與當地衛生部門合作，建立眼

科培訓中心，系統地培訓當地醫護人員。目標不是做多少台手術，而是「幫助造血」，讓當地逐步減少對外來援助的依賴。

推動香港成為上合組織醫療合作的「連接平台」。香港的優勢不僅在於自身的能力，更在於能把各方資源連接起來。內地積累了大量臨床經驗和醫療技術，但要「走出去」，需要有人把它轉化成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形式——包括臨床數據的國際認證、專業標準的對接、設備和藥品的國際註冊。香港在這方面可發揮獨特作用。下一步，可主動參與上合組織的衛生合作機制，協助把內地的醫療技術和產品，通過香港的專業平台，推廣至上合組織成員國。這不單是「聯繫人」的角色，更是「增值人」——為優質產品和技術找到合適的市場，為有需要的國家找到切實的解決方案。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參與及貢獻，自然而然成為「合夥人」。

培訓更多醫療援助人才

完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的人才培訓機制。共享基金會近年帶領一批香港青年參與前線工作，效果理想。然而，願意且有條件參與國際醫療援助的香港年輕人，依然遠遠不夠。下一步，應把這種培訓機制化、規模化。共享基金會已與港大、中大、理大簽署合作備忘錄，這是一個好開始。未來可設計專門的國際醫療救援課程，讓醫學生和年輕醫生有機會到「一帶一路」或上合組織國家實習，參與前線項目。這

批人將來會成為香港參與全球治理的骨幹力量。

在上合組織框架內拓展疾病防控和公共衛生合作。白內障手術是香港的強項，這點我們已經證明了自己。但上合組織國家需要的遠不止眼科。代謝性疾病、癌症、傳染病防控，皆是巨大需求。香港在代謝性疾病和癌症防控方面有扎實的臨床和科研基礎，完全可以參與其中。筆者最近正在籌備成立「國際癌症防治慈善基金會」，立足香港，聯動國際專家網絡，推動癌症預防和早期篩查。這個平台若運作起來，亦可成為香港參與上合組織醫療合作的其中一個切入點。

天下之治，不進則退。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夥伴把握歷史大勢，擔當時代責任。全球治理倡議提出一年，從理念到行動，一步步在推進。對香港而言，這也是一個機遇。從「健康快車」、「亮睛工程」到共享基金會，從內地到「一帶一路」，香港醫療及各界用20多年的實幹，證明了我們有能力、也有誠意參與國際醫療合作。接下來，我們有成熟的模式可以複製，有實戰經驗豐富的機構可以依託，有與國際接軌的專業標準和人才網絡可以運用。問題不在「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做得更好、更好、更高效和更系統化」。以醫療為橋，以「上合行動」為帆，香港可以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加把勁，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高水平開放促合作共贏「中國擠壓論」可以休矣



王紹基

議論風生

近期一些外國智庫和西方輿論頻繁炒作所謂「中國擠壓論」，聲稱中國龐大的製造業產能與出口

能力不僅衝擊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更在「擠壓」全球南方國家的產業升級空間與市場份額。這一論調本質上是「中國威脅論」、「過剩產能論」的舊調重彈，不但旨在抹黑中國，更企圖將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對立起來，損害彼此互信，是帶有政治目的的輿論引導。

真正「擠壓」的是關稅霸權

然而，所謂「中國擠壓論」根本經不起事實推敲，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不同，走的不是「零和博弈」之路，而是以高水平開放促合作共贏之路。中國為世界帶來的，是**高性价比的產品、技術的普及以及龐大市場機遇**，廣大南方國家都可從中獲得發展的「賦能」，這也是中國在國際上得道多助的主要原因，這樣的發展共贏何來「擠壓」？真正「擠壓」發展中國家的，不正是美國等大搞關稅霸權、「小院高牆」的國家嗎？

一些西方智庫近期炒作的「中國擠壓論」，其所謂「理據」是指中國擁有全

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製造體系，中國製造業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成本與產能優勢**，該論調聲稱這種「製造業巨無霸」效應不僅讓西方發達國家面臨「去工業化」危機，更讓那些試圖通過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實現起飛的全球南方國家陷入「無路可走」的困境云云。這種論調的問題在於半真半假、邏輯混亂、上綱上線。中國的製造業具有**成本和產能優勢**，這點不假，但卻不能因為中國製造業強大就會造成所謂「擠壓」。

恰恰相反，隨着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國家正聚焦高附加值的產業如**新能源、高端裝備、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發展，一些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亦逐步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產業轉移與外溢效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而且，中國製造業的產能，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同樣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眾所周知，工業化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與設備引進，在過去西方主導全球製造業的時代，高昂價格的機械設備、關鍵零部件和技術專利成本，構成了全球南方國家難以逾越的工業化門檻。中國製造業正好向全球南方出口國家，出口**高性价比、可靠的工業機械、電力電信設備**以

及運輸工具，使得許多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能夠以較低成本建立起本地的工業化網絡，從而「賦能」當地發展。

中國推動高水平開放的步伐不會改變，中國龐大市場的大門更會繼續向各國打開，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正**正依賴於中國產品的二次加工與組裝**。中國製造並非替代其工業，彼此是合作互贏關係，何來什麼擠壓？作為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對全球南方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農產品等都有巨大且持續的市場需求。截至2024年，中國已連續12年保持全球最大中間品出口國地位，製造業中間品出口約佔全球總量的20%。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繁榮**。隨着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東南亞的水果、非洲的咖啡、拉丁美洲的牛肉與紅酒等大量進入中國市場，都為全球南方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出口外匯與就業崗位。

西方政治偏見抹黑中國

與西方國家在歷史上通過戰爭、殖民、掠奪，以及設置技術壁壘限制後發國家不同，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在長期合作中展現出的，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的「擠壓」，而是**共同發展、共贏賦能**的



◀中國推動高水平開放的步伐不會因西方抹黑而動搖，並會繼續向世界打開龐大市場的大門，與各國形成合作互贏的關係。資料圖片

合作模式。除了貿易之外，在基礎設施、產業構建、綠色轉型、技術跨越等領域都有愈來愈深入的交流和合作，「一帶一路」建設更為多個國家帶來龐大的投資和機遇，真正實現雙贏。這種發展模式得到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和參與，與西方模式形成此消彼長，也難怪令一些國家感到不安要抹黑而後快，但這些論調卻經不起事實推敲，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偏見，不值一駁。

「中國擠壓論」的背後，其實反映了西方自身發展模式的困境，西方國家普

遍面對產業空心化、競爭力不足、發展緩慢等問題，但其精英階層卻將問題歸咎於中國的製造業，這本身就是為了轉移內部矛盾。

同時，此舉更有意分化中國與南方國家等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係。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外圍政經風險持續升溫之下，一個高水平開放、製造業強大的中國，正是全球經濟的「穩定器」與「推動器」。「中國擠壓論」可以休矣！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教育及培訓委員會主席

禁用還是放任？AI教育真正難題在於如何教



鄧飛

教育思考

人工智能進入校園，教育界正面對一道看似非黑即白、實際上極其複雜的選擇題：究竟應該容許青少年學生使用AI，還是乾脆禁止？紐約市最近作出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選擇。2026/27學年，紐約市公立學校對2-K至8年級學生實施為期一年的「學生端生成式AI」禁令；高中生則仍可接受AI素養教育，並只可在經審批的課程、職業教育或試驗項目中有限度使用AI。紐約市教育局部門解釋，政策旨在保護學生與教師、同儕之間的人際互動，以及兒童成長所需要的好奇心、創意和實體學習經歷，避免生成式AI過早介入兒童的思考和學習過程。

這種憂慮並非杞人憂天。2025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的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第12卷發表題為(ChatGPT as a cognitive crutch: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knowledge retention)的隨機對照研究。研究把120名正在學習人工智能知識的大學生隨機分為ChatGPT輔助組及傳統學習組，並在45日後進行突擊知識保留測驗。結果顯示，不受限制使用ChatGPT可能因「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

減少學習者建立長期記憶所需要的認知努力。因此，容許學生使用AI確有風險。學生可能由「我不懂，所以請AI教我」，逐漸變成「我不想思考，所以請AI替我做」。

讓學生學會正確使用AI

然而，另一項同樣在2025年發表的哈佛大學研究，卻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哈佛在《Scientific Reports》發表隨機對照研究，以194名大學物理課學生作比較，結果發現經過精心設計、採用教學鷹架和個人化提示的生成式AI導師，可以令學生在較短時間內取得更多學習增益，而且學生的投入感和學習動機亦較高。換言之，真正的變項未必是「有沒有AI」，而是AI被設計成替學生思考，還是引導學生思考。

同時，問題的另一面同樣值得警惕：全面禁止AI，也可能製造另一種教育不公平。紐約的禁令約束的是公立學校體系，私立學校並不直接受紐約市公校這套政策規管，可以自行制定AI教學安排。這就可能出现一個弔詭局面：公校學生在校內不能使用生成式AI，但較富裕家庭的學生仍然可以在校外使用付費AI服務、接受家長或私人教師指導；部分資源充裕的私立學校更有條件自行設計AI課程、專題研習及

個人化學習。若這種差異持續數年，當大學和就業市場愈來愈重視AI素養時，究竟哪些學生更佔優勢？這正是「數碼鴻溝」在AI時代的新形態。過去的鴻溝主要是「有沒有電腦、有沒有寬頻」；今天更值得擔心的，是有沒有機會在專業指導下學會正確使用AI。

筆者早前亦警告，香港若缺乏系統性支援，不同學校、不同科組之間很容易衍生新的「數碼鴻溝」。教聯會一項涉及185名香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教育工作者的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表示AI應用仍停留於「個別教師自行探索」階段，能夠由全科組系統推動的只有2.2%。如果AI教育主要依靠個別學校和教師自行摸索，資源較豐富、人才較充足的學校自然走得更快，資源有限的學校則可能愈來愈落後。

這種憂慮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警告相呼應，其在2025年發表的專題報告《AI and education: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learners》(《人工智能與教育：保障學習者的權利》)中明確指出，數字化及生成式AI雖然可以擴大教育機會、推動個人化學習，但同時存在加劇既有不平等的風險。報告指出，截至2024年全球仍約有26億人無法上網，傳統「數碼鴻溝」因此有可能進一步演變成「AI鴻溝」(AI

divide)，弱勢及邊緣群體尤其容易被進一步拋離。UNESCO因此主張以「以人為本、以權利為本」的方法推動AI教育，確保科技增加所有人的學習機會，而不是令部分學習者掉隊。因此，公平、可負擔及可持續地接觸網絡與數碼設備，已經成為保障教育權的重要條件。

「全面放任」與「全面禁止」其實都是相對容易的政策；真正困難的，是建立一套既保護學生思維發展、又不剝奪學生AI學習機會的課程和教學法。AI教育首先不能只教學生「如何下Prompt」。真正的AI素養，是懂得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時候不應該用；懂得驗證答案、辨識幻覺、偏見和錯誤資訊；更重要的是懂得保留自己的思考主體性。筆者近期提出，教師可以要求學生比較不同AI的答案、查證來源、找出錯漏，甚至反過來批判AI。學生由「向AI要答案」，轉變為「審問AI的答案」，這才是真正的AI素養。

讓每位學生有公平機會用AI

低年級可採取「少用、受控使用」，重點仍放在人際互動、閱讀、寫作和實體探究；年級愈高，才逐步增加人機協作。AI亦不應預設直接提供答案，而應採取類似蘇格拉底式提問、分步提示、錯誤診斷

和個人化練習，讓學生經歷必要的「思考掙扎」。作業評估則應增加口頭答辯、學習歷程、AI使用紀錄和學生反思，評核的不是誰最懂叫AI寫答案，而是誰最懂利用AI深化自己的思考。

這些都不能只靠每所學校自行摸索。教育部門有必要成立一個由課程專家、前線教師、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專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數據倫理專家等組成的「學生AI學習督導及追蹤研究委員會」，進行跨年度、跨年級的持續研究。研究要追蹤使用AI後學生的閱讀理解、獨立寫作、知識記憶、批判思維、自主學習、創造力、學習動機的變化，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學校之間的差距；同時研究教師採用什麼教學策略最有效，哪些做法會造成依賴，哪些做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研究結果應定期向教育部門提出政策調整建議，亦轉化為前線學校可以直接採用的課程、教案和評估模式。

最理想的AI教育，不是讓富裕家庭的孩子獨享AI優勢，也不是以禁令把公辦學校學生隔絕於AI之外；而是讓每一名學生都有公平機會，在專業教師引導之下學懂駕馭AI，同時仍然保有獨立思考、主動求知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